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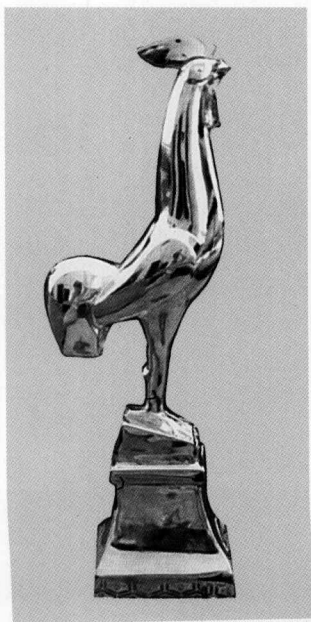
“金鸡” 评述 一纪

于敏 著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金鸡 评述 一纪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2001 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“金鸡”评述—纪/于敏著. —北京:中国电影出版社,
2001.9

ISBN 7-106-01730-2

I. 金… II. 于… III. 电影金鸡奖—概况—中国
IV. J992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61145 号

“金鸡”评述—纪

于 敏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(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)邮编 100013

电话:64299917(总编室) 64216278(发行部)

E-mail: Jsja@netchina.com.cn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丰华印刷厂

版 次 2001年10月第1版 2001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50×1168毫米 1/32

印张/5.125 插页/3 字数/120千字

印 数 1-1000册

书 号 ISBN 7-106-01730-2/J·0764

定 价 15.00元



第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委合影
(第二排右起第二人为本书作者)

前 言

本书评述“金鸡奖”的大奖影片,从第一届到第十二届。按中国历法,12年为一纪。书名本此。

凡有所作为,必有其目的。我谨以此书奉献于世人,目的有三。其一,存真。我敢于断言,文中所及,都是亲见、亲闻、亲感,经得起推证。其二,博及。不必讳言,电影界多年以来,理论活动落后于创作实践。其因盖在于上无所倡导诱引,下无所推波助澜。本应培植一支有组织的队伍,但是迄今只有散兵游勇。自1978年以来,22年间有多次理论潮头,如关于电影语言,电影思维,电影与戏剧性,电影与文学性,电影的功用,电影的创新与探索,电影的民族特色与借鉴外来等等,虽时有吟唱,却未能形成交响乐。其三,引玉。“金鸡”评委会在评价作品时,自然各有高论,涉及美学和电影美学的许多根本性问题。就它们展开讨论,必有益于“金鸡”的提高和发展。“独乐乐不及众乐乐”,我寄希望于历届“金鸡”的评委们。

每一事物诞生之后,必有发展变化。“金鸡”也是一样。但是“用”可变而“体”不可变。“用”可变,“双百也”。立框框,定调调,设禁区,严审查,已经使我们在17年中吃尽苦头。“体”不可变,“二为”也。22年来,电影时有赝品、低品、怪品,其总因盖在于借“双百”以忽视甚至排斥“二为”。小道理大道理一个样。放

弃四项基本原则，即使鲜花满地，彩虹蔽天，还有社会主义么？前进必有曲折，固然，重要的是从中学聪明些。艺术有美丑之分，也有是非之分。区区之见，以为是非先于美丑。是非不分，遑论美丑。艺术不分是非，这是时髦调调。这一论调却不像超短裙和火箭鞋那样一风而过，而是带有黏着性和普遍性的。艺术的长河泥沙俱下。有失足没顶，随波浮沉者，有逆流而上，屹立中流者。人各有志，只好道不同不相为谋。如果讲时代的需要，人民的需要，首推那“英姿竦竦涛头立，手把红旗旗不湿”的弄潮儿。说了许多，无非为了一点，即“金鸡”的评选方法，评选程序等等可变，而“金鸡”的学术性不可变。变了，就不是本质的“金鸡奖”了。请不要以为我辞费。的确有过这样的曲折，企图抹煞“金鸡”的学术性，从而抹煞其专家性和权威性。

电影界是否需要理论权威？回答是肯定的。权威二字，可以有不同的理解。我字典里的权威，不是自以为是、一锤定音、目无凡尘、盛气凌人，而是坚持原则，又虚心待人；见解独到，又博采众长。权威不是自封的，而是出于众望所归。

人无完人。失误人人难免。这里需要批评和自我批评。晚近以来，这个词语大受冷落了，离开批评和自我批评，等于讳疾忌医，绝难保持思想的健康和清醒。为了强调自我批评的重要，毛泽东比之为天天洗脸。可惜伟人晚年违背了他向全党的谆谆告诫，造成空前的历史浩劫。可见圣贤与愚氓，其间不容一发。

“金鸡”的学术研讨会，有待于和“金鸡”评委会的成果更紧密地相连。评委会的评论和争鸣，为学术研讨会开路，学术研讨会则为之延续和集成。理论愈联系实际，理论（评论）就愈活跃，愈对创作活动有益，我常说自己是不及格的评委，这不是故作谦虚而是切合实际。我不是科班出身，所以关于电影的十八般武器，我能舞弄的不过两件三件，而且也不娴熟。这迫使我在评委

会上向各路英雄学习。每次评委会在我就是一堂大课，而人同此心者也不只我一个。在第七届评委会上，一位资深影人说：“从来很少参加民主空气这么浓厚的会，也很少参加学术气氛这么浓厚的会。”可见“学术、争鸣、民主”的方针是合乎实际的，是可以成为“金鸡”的好传统的。

“金鸡”一向保持正直和清廉，这在今天尤为可贵。在我亲历的十多届中，我敢断言，没有一个评委稍徇私情，或稍有杂念。也没有一个评委容忍私情和杂念。风气一经形成，自然成为不可动摇的。前几届评委都是尽义务而不取报酬，尚须交少量的餐费。后来随社会生活的变化而付给少量的劳务费，仍保持清廉正直的特色。讲社会主义特色，这应是其中之一。

在评委会的评选过程中，我最担心者有二：一为滥，二为缺。滥者，滥竽充数之谓。缺者，买椟遗珠之谓。“宁缺毋滥”和“慎勿遗珠”实相反而相成。头脑中多一点辩证法，少一点形而上学，自然可以立于正而不偏斜。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。长期公正而不负人，有赖于评委们的铁骨铮铮。

每一大奖都是按提名影片优中选优的。凡提名影片，都是当年优秀影片的第一档。因此提名等于优秀，而且是高于其他优秀的优秀。我念念不忘周总理的教导：我们不搞锦标主义。虽然历年都强调提名的重要，不幸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。若将第一至第十二届的大奖影片排队，显然仍然有高低而不是并肩齐。甲年的大奖也许还不及丁年的提名。这中间有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作用，因为评委只按当年所达到的水平，不按历史上的最高水平。评价艺术作品，向来没有一个统一不变的参照系。这里我特别强调，必须重视提名，因为这类影片同样提供研究的课题。也必须通过新闻媒介，反复地申明这一点。首先电影界的同仁要承认，提名也是奖励，也是荣誉。公以待人，明以处事，刚

正自持,力求中的,不溢美也不泯美,这是“金鸡”应当始终保持的品格。

我抛砖,落地未必有声。待玉振,其鸣必然琅琅。

2001.1.3

目 录

前言·····	1
愿“金鸡”长鸣·····	1
新时期开创了电影的新格局	
——回忆第一、第二届“金鸡奖”评委会·····	15
热烈的争论 和谐的结果	
——“金鸡”第三、第四届评选回忆片断·····	28
“金鸡”要长鸣,必然经风雨	
——“金鸡”第五、第六届评选概况·····	45
曲折后的顺利,顺利中的失误	
——“金鸡”第七、第八届评奖记略·····	64
辨是非而后论美丑	
——“金鸡”第九、第十届的大奖评选·····	83
一年转折 一年丰收	
——“金鸡”第十一、第十二届最佳影片评选概况·····	103
文成余意犹彷徨·····	120
附录“金鸡”书后·····	131
“金鸡”抒怀·····	143
“金鸡”和“百花”有无一致性?·····	152

愿“金鸡”长鸣

题 解

真正是岁月不饶人。到1997年为止,金鸡奖已满十七届。值得庆幸的是它声誉不错,在海外也有一定的影响。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。早在十届过后,我曾建议认真地做一总结,约请若干在电影界享有信誉的评委,广开言路,研究“金鸡”的成就和不足,以及如何改进等等。由于种种原因,这一愿望未能实现。我作为“金鸡”创始人之一,从第一届到第十三届得以滥竽其间,很是荣幸,因之对它情有独钟。我愿“金鸡”长鸣,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。关于“金鸡”的性质和评选原则,我历年写了一些文字,其中有《金鸡抒怀》一文,比较系统地讲了我的意见(《文艺报》1992年10月31日)。

世上没有永恒的事物。任何人和事,完成了历史任务,即行退出历史舞台。这是按常情说的。我们伟大的人民需要电影。如果电影能满足他们多样的、日益增长的需要,我国电影就能长存和发展。如果“金鸡”能对电影的创作繁荣和理论活跃有所助益,它自然可以不断地引颈长鸣。反之,如果不能起这样的作用,而每年又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,举办呼呼隆隆花花哨

2 “金鸡”评述一纪

哨,内涵却干干瘪瘪的颁奖会或电影节,即使它鸣,也必然喑哑啁嘶难为听。这样,鸣还不如不鸣。可见“金鸡”的长鸣是有条件的。简言之,这条件就是有益于电影的发展,有助于影人素质的提高。我们常说,“金鸡”的评选要评出水平。什么是这水平?学术性。“金鸡”评选的严肃性和公正性,其基础是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学术性。这话不是无的放矢,因为商业性,甚至于投机性,正在向“金鸡”的学术性挑战。维护“金鸡”,不能不首先维护其学术性。“金鸡”是以艺术专门家的评选区别于百花奖和华表奖,它的特点是以学术性为第一标志。这在下文将详加说明。当然,凡有区别,必有联系,所以“金鸡”的特点不是特殊,更不是脱离群众。

前进必有曲折,这是规律。有志者不怕曲折,并且从曲折中学得聪明些。十多年来,“金鸡”经历了不少风雨和曲折。有些曲折来自外部,来自某些权威人士,有时是影响“金鸡”生死存亡的大曲折。从积极方面想,这些曲折大有好处,能促使评选的准备工作更细致,使评选活动更慎重,使咨询工作与四面八方的联系更周详。有些曲折则来自中国电影家协会(简称影协)内部。人的主观认识客观,从来是很难的事。1977年以后,我国电影恢复了生机,日见繁荣。与此同时,开放的时代造成开放的头脑。以“二为”为总方向,以“双百”为总方针的政策不变,而在各种文艺思潮的激荡中,认识上的差异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。从积极方面想,这也是好事,可以锻炼人们的识别能力。艺术有美丑之分,也有是非之分。据我的浅见,是非之分先于美丑之分。艺术的真善美把真放在首位,这很有道理。真和是同义。是即存在,存在即真实。真实的规律性是实在的,也就是“是”。艺术的真实不等于生活的真实,可又不能违背生活的基本规律。想象、夸张、提炼、概括,甚至于变形和荒诞,都受生活的基本规律

制约。天马行空也离不开那个空。人类只要有艺术,艺术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就是一万年也探讨不完的课题。对于艺术品,人人都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。评论的自由首先受评论家自己头脑的制约,而他的头脑又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。人认识自身所受的制约,才有真正的自由可言。这些都像是空话。但我是有感而发,有感于历届评委会上的争论,即争鸣。

活跃的争鸣来自艺术民主的氛围。没有宽松的民主环境,不会有畅所欲言的争鸣。争鸣不是目的,而在于各抒己见,取长补短,从不同中求同,求大同,以达到评选的最后结果。电影界需要团结,这团结是在大的方面分清是非美丑的团结,不是在一片混淆中的互相拥抱。

为了“金鸡”的长鸣,为了后来者关于“金鸡”的研究,本文将按历届“金鸡奖”的过程,提供一些资料,包括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,评介评选活动中艺术思想的分野,抒发我自己的感受和感想。行文只限于我个人的亲见亲闻亲感,涉及别人的也都有根有梢,以有凭有据的资料为准绳。个人的见闻和感知都极有限,但又极为亲切。好在“金鸡”的评委大有人在,都可以给我有益的教正。我始终相信,集体的智慧优于个人的智慧。

题一 “金鸡”为何而鸣

“金鸡”为何而鸣,其必要性何在?有一句谚语说:“需要是发明之母”。“金鸡”不是从什么人的美梦中飞来的。“金鸡”的诞生必须从国内的大环境和电影界的小环境来说明。回溯十年动乱期间,影协是“砸烂”单位。砸烂的程度是片瓦不存,人员风流云散。电影界是重灾区,这为世人所周知。“拨乱反正”之后,全国各项工作一步步纳入正轨,人心振奋,各

条战线都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。影协恢复于1978年,当时大环境很好,而条件则极为困难。办公地点是租用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20多间屋子,还有两间仅避风雨的木板棚成为影协书记处的办公室。人员从四面八方调来,其中不少人都受过红卫兵的揪斗和冲击。一切办公用品都是临时购置,新则新矣,只是十分简陋。现在人们回忆这时期,都还恋念难忘,因为内部上下团结一致,向心力很强,工作的热情很高,努力的方向十分明确。按照影协章程,影协的工作除日常会务,主要是通过各种学术活动为电影界服务,包括举行各种形式的艺术研讨会,办刊物,办“百花奖”,进行国际性的学术交流等等。

影协主办的《大众电影》是图文并茂的月刊,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。影协被砸烂,这一刊物随之夭折。早在1962年,《大众电影》创办的“百花奖”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。人们不会忘记第一届颁奖时的盛况。周总理的关怀,郭沫若同志为获奖者颁奖,陈毅、谢觉哉、茅盾、夏衍、周扬等同志的莅临,使一代电影艺术家受到无限鼓舞。可惜只办了两届,也就在十年浩劫中被扼杀。影协恢复,《大众电影》随之重新出版,“百花奖”也于1980年恢复,为第三屆。

十年动乱是真伪颠倒,是非颠倒,美丑颠倒,善恶颠倒的时期。空前的倒行逆施留下惨痛的教训,过来人绝不可忘记。接受教训绝不能只是抚平伤痕。在任何情况下,健康的世界观总会引出健康的思考。“拨乱反正”,这个“正”字是什么?正是回到马克思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上来。回到不是停止,而是起跑,沿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轨道起跑。从这一点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,给予怎样高的评价都不过分。关于“解放思想,开动脑筋,实事求是,团结一致向前看”的号召,关于“勇于思考,勇于探索,勇于创新”的呼唤,都是中华民族转入新时期的精神标

志。

在我们文学艺术事业的全局中,电影是最敏感的部分。为什么?在讲到电影本性时,人们从西方引进种种学说。如果从积极方面着眼,这些都有助于电影美学的深入研究。有“新潮”评论家嘲笑我,说我“一讲到电影美学就不知所云”。不管我关于电影的知识多么肤浅,我敢于强调电影本性中的群众性。这个“性”不可忽略,更不可抹煞。

对于电影,人人都可以指手画脚,说三道四。他掏了腰包,不只买来一张影票,也买来评价影片的权利。群众的需要,就其总体说,是和时代的需要、社会的需要、党和国家的需要相一致的。引起轰动效应的影片有许多是优秀品,在这种场合,必然是精神和物质双丰收。也有不少赝品引起一时的喧嚣。它们除了败坏观众的审美情趣,也降低了电影本身的艺术品格,同时又在社会意识形态范围里造成不利的影响。这在下文将举出例证。正因为电影艺术的群众性是任何别的艺术所不能比拟的,它引起上上下下的普遍关注自然是合理的。这一合理性中包含言人人殊。对于同一部影片,不同的艺术观和不同的欣赏情趣引出不同的评价,有时是很不相同甚至互相对立的评价。面对是非非,要不要有所澄清,有所引导?回答应当是肯定的。用什么方法引导?是用行政干预的方法,还是用社会活动的方法,用广开言路的评论来进行?回答应当是很清楚的。是用文件指示的方法,还是用艺术家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自我教育共同提高的方法?回答也应当是清楚的。

影片的生产于1977年恢复。不难想像,被砸烂十年的各制片厂恢复起来有多么困难。本来已经老化的设备闲置了十年,更老化了。原来中年有为的创作人员,经过十年摧残,不少正步入老年的门槛。他们当中不乏有志之士,一些青年影人也崭露

头角。这特别令人鼓舞,证明过去关于后继无人的议论是过虑。到了1979年,全年生产的影片已达67部。在总产量中,约有15部是好的或较好的,其中《吉鸿昌》、《归心似箭》、《小花》、《甜蜜的事业》、《于无声处》等受到广泛的好评。成绩的取得,归功于影人迎着困难上的勇于探索、勇于创新的精神。应当大书特书的是,改革开放,“双百”方针的认真贯彻,为我们敞开了勇猛进取、大胆创造的广阔天地。

1980年的影片生产仍然保持了强劲的势头,以年产82部载入史册,其中好的较好的有《天云山传奇》、《巴山夜雨》、《法庭内外》、《苗苗》、《丹心谱》等。艺术家们的眼界更为开阔了。题材的禁区被冲破。新的银幕形象令人耳目一新。艺术表现方法和电影造型手段都有新的探索。总体艺术水平较之以往有所提高。

前进伴有曲折。百花齐放,放出来的就不只有玫瑰、玉兰、梅花、山茶之属,也会有倬倬丁、狗尾巴花,乃至罍粟、变种的紫罗兰、郁金香等等。与艺术较为完美,内涵较为纯正的作品同时出现的不免有一些低劣品。这里有一个观察和评价艺术作品的方法问题。机械论的方法,形而上学的方法,都不可取。只可以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,用马克思主义艺术学的方法。在这一点上,只能求大同存小异。如果这一条不能取得共识,那就只好你说你的,我说我的了。

人们常说,国门大开,不免飞入一些苍蝇蚊子。这些小飞虫不足虑,可虑的是它们带着细菌。又岂只是苍蝇蚊子,混进来的难道没有狐狸和狼?没有任何一门艺术不带有意识形态的印记,或者明显或者隐蔽罢了。与艺术创作相关的技术方法和表现方法则不然,什么人都可以用,要看他表现的是什么,要达到的艺术意图是什么。电影的蒙太奇,电影的长镜头,谁都可以拿

来用,而不同的艺术主体则造成不同的艺术效果,或者提高人们的美感经验,或者降低他们的审美情趣,或者更坏,甚至毒害他们的心灵。用同样的电影手段,好莱坞能拍出反法西斯的、张扬人性的、呼唤社会公德的佳作,也可以拍出暴力、凶杀、淫靡、教唆犯罪、种族歧视的大量低劣品。这些诚然都是常识,可是被艺术心灵忘记的常常是这些常识。

在为 1980 年的电影成就唱喜歌时,不能不看到一些令人不安的苗头。这有两方面。一方面是某些不健康的创作倾向,另一方面是某些背离公认的艺术指导思想的言论。银幕上的女性裸体开始撞击人们的眼睛,也有床头风波,不过都还是犹抱琵琶半掩面,比之西方的床上大战只是小巫见大巫。有创作者声言,他就是要用裸露来反封建。这么说,潘金莲就是我们反封建的老祖奶奶了。很不够酣畅淋漓的这么一丁点儿不外是一种试探,试探市场也试探舆论。舆论远不及市场的优势,于是床头加拳头的戏法也就日渐抖开包袱了。

我国电影的初期,有过不少武打片武侠片之类,多半是下三流。新时期武打片重新出现,打开题材的一个方面。如果鼓舞斗志,宣扬正义,抨击邪恶,未尝不是好事。可惜这类影片一出现就不免以感官刺激为招徕,比如把血淋淋的眼珠挑在刀尖上之类。我国是武术之乡。在我们古典文学和古典戏曲中,有许多武打场面写得健康活泼,花样翻新,引人入胜。林冲棒打洪教头,打得多么潇洒;武松醉打蒋门神,打得多么有气魄;杨志比武,打得多么声势煊赫。戏曲中的大闹天宫,打得多么梯突滑稽,蛮有猴气。不向我们宝贵的艺术传统中探胜取宝,却一味模仿西方的末流,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。

从创作的倾向性上着眼,上面这些都还是小焉者,因为表现得直接明白,易于鉴别和判断。有的影片则不然。以创新为标

榜,以电影的现代观念为依据,以重大的社会历史为背景,以苦心孤诣的银幕造型为手段,创作者宣泄其内心郁积,矛头所向,则是我们立国的根本。按《苦恋》拍成的影片《太阳和人》可说是突出的例子。

正所谓“风起于青萍之末”,自1979年以后,一些奇谈怪论已经在艺坛上和影坛上徐徐吹来了。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首先被驳斥,说“反映论过时了”,说“反映论不够用了”。开始我觉得奇怪。反映论是人的主体认识客观事物的普遍规律,违背了就不能正确感知生活和理解生活,也就不能艺术地表现生活。生活的多样决定艺术的多样,而不是相反。后来细想,才恍然大悟,把反映论降低为一种方法,与其他五花八门的方法并列,从而达到先贬抑后否定的目的。否定反映论,自然也就有理由拒斥生活实践第一位,生活是创作的惟一源泉的观点,为无条件的“创作自由”打开绿灯。于是“凭自我感觉进行创作”,“爱和性是人的本质”,“人性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”等等,也都摇摇晃晃地登台亮相了。在1980年影协举办的一次创作座谈会上,有人竟然大讲“三破”,“一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艺的几封信,二破列宁的《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》,三破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”,诚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。这些出格的谬论虽然引起一些同志的警惕,但是由于文艺界正沐浴在“双百”的春风中,只好采取包涵的态度,没有立即给以驳斥。况且这也不是个别人的观点,而是一种思潮。这种思潮有反对十年动乱极左的因素,究其实质,则有更深的根源。十年的是非颠倒真伪颠倒造成的思想混乱不可低估,应劫而生的则是“三信危机”(对马克思主义,对社会主义,对共产党)。长期脱离群众,脱离实际,又不刻苦地钻研文艺理论和文艺史,这样的艺术头脑正好是接受和繁殖西方艺术思潮细菌的温床。大言不惭,其实是无知。“马列主